

湖南先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熊贤品¹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湖南先秦史的研究及重建，需合理运用传世及出土文献、考古材料。就相关例证来看，传世文献中的湖南炎帝、黄帝等古史传说，多系传播而来，并非原始发生地，不应把相关传说人物“湖南地方化”；从出土文献而言，西周《静方鼎》所谓“湘侯”系误读铭文，清华简《楚居》也无法反映“楚源于湖南”；从考古而言，高庙文化应当与伏羲、炎族团无关。

【关键词】：湖南 先秦史 传说 静方鼎 清华简 楚居 考古

【中图分类号】：K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2019）12—0098—07

关于湖南先秦史的研究与重建，经过前辈学者耕耘，已经有许多重要成果^①。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相关文字史料较少，在考古材料的理解上也存在差异，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注意。本文拟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考古材料三方面，各选取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不当之处，尚祈赐正。

一、传世文献先秦传说“湖南地方化”及其问题

在湖南地区有一些古史人名、地名的传说，如：

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卷11记载，宋淳熙十四年（1187），澄州慈利县（今湖南慈利）“周赧王墓”旁发现青铜器，实则此为“周赧王”墓所在的诸说之一，存疑待考。

流经长沙城区的“捞刀河”，在地方文献记载中，多表述为与三国关羽有关。但从清代的古地图上看，多是作“捞塘河”。按，这一文字差异可能和读音有关，在长沙地区的方言中，“d”、“t”关系比较密切，如“油桃”经常读为“yóudáo”，据此，“捞塘河”演变为“捞刀河”，应当也与此有关，自然和所谓的关羽故事无关。

益阳地区有所谓“陆贾山”，一些文献将此与汉代出使南越的陆贾相附会，实则其名更多作“陆家山”（或作“陆角山”），在汉语中“j”、“g”的联系是比较紧密的，如北方地区常见的“×各庄”实际就是“×家庄”，因此所谓的“陆贾山”和汉人陆贾无关的。

由此可见，相关地方文献中的地名及其相关传说，要经过考证后，才能准确发掘其史料价值。湖南地区现存有炎帝陵、舜帝陵、嫫祖墓、二妃墓、善卷墓等遗迹，由此学者也展开了对黄帝、炎帝等传说人物的研究，但纵览此前的相关研究，也存在一些可思考之处。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将古史传说人物“湖南地方化”，如有学者认为，炎帝族团与湖南沅水流域关

¹作者简介：熊贤品，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湖南长沙，41008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清华简与商周军事地理研究”（18CZS006）

系密切，而不应当在黄河流域。就具体的研究而言，在许多学者的考订下，炎、黄等古帝均出湖南，由此似乎湖南系当时的中心区域，但相关考证其实也都各自存在问题。

1. 关于黄帝，有学者考证黄帝出生于湖南，并认为古崇山、尧山、会稽山均在湖南。古书有“黄帝生于寿丘”的记载，而长沙星别称“寿星”，则长沙别号为“寿丘”。此外，湖南湘阴县有地名“黄陵”，论者推测“也许黄帝与舜之二妃葬同一山上”，而其附近又有黄水（疑为古姬水），从而认为黄帝即位及死后葬在湖南无疑。于此，贺刚曾有判断，认为“孰是孰非，仅凭为数不多且互有抵牾的传说材料尚难确断”⁽²⁾，笔者认为是比较合理的。

2. 相对于黄帝传说，湖南的炎帝传说资料更为丰富和悠久，因此探讨更多。有学者认为，炎帝出于湖南⁽³⁾，也有学者考证舜晚年避居湖南永州舜皇山⁽⁴⁾。还有学者具体考证了古帝王的出生日期与地点，认为“炎帝神农公元前 5080 年辛巳诞生于湖南怀化的会同连山乡，黄帝轩辕氏公元前 4660 年左右诞生于湖南的长沙寿丘（即今岳阳君山的轩辕之丘）”。

但是，从文献的记载来看，早期的炎帝传说主要流传于陕西、河南、山东等地⁽⁵⁾，何以湖南会有炎帝传说，学界对此曾有不同的探讨。如赵世超指出，炎帝族原本活动于黄河流域，后来在阴阳五行观念的影响下，被人为分配到了南方，而湖南炎帝陵的出现也于此观念有关⁽⁶⁾。这一观点比较中肯，从神话故事的流传来看，应当有一个“原发地”和“传播地”的区别，而从湖南地区的“炎帝传说”来看，明显属于“传播地”的范畴。朱汉民认为“神农炎帝”成型于汉代，是南方农神崇拜与北方英雄崇拜的结合；最早有炎帝安葬地点的记载见于晋朝，指出炎帝神农氏葬于长沙，并没有关于炎帝陵具体方位、地点的记载。此外，关于湖南炎帝陵的确切记录是从宋代开始的，而炎帝陵的修建与宋朝宣扬火德文化有关⁽⁷⁾。王震中先生曾指出，面对各地出现的炎帝传说，此前的做法或是采用排他性方法，只承认某一地而排除其他的地方；或者是采用“炎帝族迁徙说”，主要是因为炎帝族的不断迁徙。上述两种方法均有不足，王先生就此提出“民族融合”一说，认为各地“炎帝”及其各地炎帝传说，应当是西周以来随着民族融合而出现的，是民族融合的结果⁽⁸⁾。上述两位先生的意见值得重视，湖南的炎帝传说，应当是从中原地区传播而来的，不应据后世的文献记载，来考订所谓“湖南炎帝遗迹”。

3. 关于尧，有学者认为“五帝时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江北、江南的先民都尊奉他们为祖先，形成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和各种遗迹，湖南攸县的‘尧帝宫’等遗迹亦是如此”⁽⁹⁾，也有学者提出，“湖南攸县之丹陵、尧山等尧帝生、葬地遗迹是有较充分的古文献依据的，河北、山西、河南、山东等地的尧迹当是尧的后裔带去的，抑或是好事者的附会”，并肯定尧出于湖南。实际上，从上说学者所依据的主要文献来看，年代大多也较晚，可能缺乏说服力。

4. 关于舜，《史记》有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舜）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据此，历来不乏学者认为舜出湖南。近来郭静云也认为，舜在《楚辞》里被称为“湘君”，由此舜应当属于湖南地域⁽¹⁰⁾。按，此说证据不足，一则关于舜是否是湘君，在学界还有不同的意见。其次，即使认为舜为湘君，那也只是在舜死后，而其生前并未成为湘君。因此，显然不能因在《楚辞》里“舜”可能被称为“湘君”，而认为舜就应当是出于湖南地域。郭伟民指出，“关于舜帝和舜葬九嶷，只能是一种传说，是人们口述和记忆中的历史，甚至是重构的历史，而不能成为信史”⁽¹¹⁾，周书灿则推断其原因，认为湖南地区“舜葬苍梧”等传说多与历史事实相抵触，其发生可能与三苗南迁有关⁽¹²⁾，上述意见都值得注意，由此也说明将舜“湖南地方化”的不合理性。

5. 关于禹，有学者认为湖南攸县得名与大禹之妻攸女有关，尧和禹均埋葬在湖南攸县，按《水经注》已明确指出，“县北带攸溪（即攸水），盖即溪以名县也”，可见“攸县”之名与“攸水”有关，而非如上述所论。

近期还有学者考订，认为《墨子》载禹葬会稽山，《山海经》载会稽山在楚南；《史记》认为禹葬会稽之山在江南沅水流域；而沅水之畔的古沅陵县境内有会稽山地名，有禹庙、禹王碑、禹穴等古迹；又沅陵地名源于“元陵”，具有“天下第一陵”的含义，由此表明湖南古沅陵地区是大禹陵墓所在地⁽¹³⁾。实则根据此文所述，关于禹陵所在，此前有“绍兴说”“辽西说”“山东说”“河东说”的等意见，作者认为“这些都因证据乏力无以让学术界侧目。笔者在此大胆提出禹陵在沅陵新说，或可了却

这桩历史悬案”，但实际上可能也未必如此，如论者最重要的论据之一，是认为“沅陵”地名源于“元陵”（也就是“天下第一陵”），从秦简做“沅陵”和相关铜印作“元陵”来看，“元”、“沅”系通假用字，并无内涵上的差异。从“沅陵”地名来看，北枕沅水，南傍土阜，古代“阜”即“陵”，据此“沅陵”应当是从地理而得名。由此即可见，论者认为大禹陵墓在湖南沅陵的意见，还是缺乏说服力的。

由上可见，依据古籍中的一些记载，湖南地区的上述古史人物故事，应当是传播而来，将炎帝、黄帝、尧、舜、禹等传说人物“湖南地方化”并不合理。实际上，上述问题属于学界讨论已多的“信古”、“疑古”之争，何以在有关湖南古史传说的讨论中，“信古”现象较为突出，这可能是在具体的学术讨论之外，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二、出土文献所见湖南先秦史料辨析二则

出土文献材料补充了传世文献的不足，如《鄂君启节》所记载的湖南地理情况等，推动了对湖南先秦史的研究。不过也应当看到，依据出土文献而对关湖南先秦史的研究，也还有一些问题可以再讨论：

1. 西周《静方鼎》所谓“湘侯”辨析。

目前发现有一件《静方鼎》（《铭图》2461），铭文如下记载：

佳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师中静省南或（国）相□⁽¹⁴⁾

曾有前辈学者连读为“南国相”，认为铭文中的“相”为地名，具体所指就是“湘”，即湖南地区；并将之与此前《作册析尊》的“相侯”（《集成》6002）相联系，认为“相侯所封必不在中原范围”⁽¹⁵⁾。此后“南国相（湘）”的断读被采用，如王辉先生认为相应该是地名，但是“地望不明”⁽¹⁶⁾。也有学者在前述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静方鼎》的“省南国相（湘）”铭文，表明“至少在西周昭王之世，湖南的局部地区即纳入了周人的政治制度框架之下”。上述论断颇为重要，目前在湖南地区的一些博物馆的展览中，都采用了上述意见而布展和说明。

但是从整篇铜器铭文的释读来看，可能还需斟酌。先来看看《静方鼎》“南国相”的问题。实际上，本文从铭文拓片、摹本等来看，所谓的“相”字较为模糊，因此一些学者，如张懋镕⁽¹⁷⁾、彭裕商⁽¹⁸⁾，及《新收》等对本字缺释⁽¹⁹⁾。

另外，本器铭文的断读，是一个关键问题，具体而言，就是“相”应当上连“省南国”，还是下连“设（居）”，学者们于此意见不一致。并且即使就同一学者来说，其观点可能也会发生变化，比如张懋镕先生在前引1998年发表的《静方鼎小考》一文中，断读为“省南国，□设居”，其后在2001年发表的《静方鼎的史学价值》一文中，则改为读“省南国相”⁽²⁰⁾。

从铭文内容的理解来看，赞同“南国相（湘）”意见的学者，一般都断读为：

师中累静省南或（国）相，设（居）⁽²¹⁾。

但问题是，这种断读未必准确，如前引彭裕商论著中释为：

惟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师中暨静省南国，□设居。

他并没有连读成“南国相”。何景成先生曾引用本器铭文，也未连读：

师中累静省南或（国），相设（居）⁽²²⁾。

近来张海先生也讨论到本铭文，也做如上断句，并指出“相设（居）”也“即视察并选择筑行宫之地”⁽²³⁾。

其实，就相关前辈学者自己的意见来说，本身也是有变动的，在1997年发表的《静方鼎与周昭王历日》一文中，将“相”释为“静”，下读为“静设（居）”⁽²⁴⁾，而没有与其上的“省南国”相上读。但其后同年所写的《静方鼎补释》一文中，已经改释为“省南国相，设居”⁽²⁵⁾。

可见，如果赞同“相”字之设，也还存在两种分歧。而上述两种意见的差别在于，前者将“相”理解成表示地名之名词，而后者则理解成动词。按，联系到《中鬲》（《集成》949，西周早期）铭文“王令中先省南或（国），贯行，设在曾”，《中方鼎》（《集成》2751、2752，西周早期）铭文“王令中先省南或（国），贯行，设王”等来看，上述诸器铭文“省南或（国）”均没有接宾语。同时，再结合《静方鼎》其后的铭文“设居”来看，笔者认为“相”为动词之意见更为合理。“相”有“选择”的意思，如《周礼·春官·籥人》：“上春相籥。”郑玄注：“谓更选择其蓄也。”《周礼·考工记·矢人》：“凡相筈，欲生而转。”郑玄注：“相，犹择也。所谓‘相设（居）’也就是‘择地设立驻蹕地点’的意思。

并且，就“相（湘）”的理解而言，早期文献中的“湘”确有地理方面之含义，包括一为水名，即湘江。如《楚辞·离骚》：“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说文》：“湘，水。出零陵阳海山，北入江。从水相声。”二为山名。《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南至于江，登熊湘。”裴骃集解引《地理志》：“湘山，在长沙益阳县。”张守节正义：“湘山一名编山，在岳州巴陵县南十八里也。”但上述都是具体的山名、水名，而不是作为今湖南地区之代称。而“湘”用来代指今湖南地区，则时代比较晚，如南北朝柳恽《江南曲》“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其中的“潇湘”大概已经用来指代今湖南地区。但从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一直到清初分省之际，湖南省别称仍长期为“楚”，或称为“楚南”、“南楚”，此后才出现湖南之代称由“由楚改湘”的彻底转变⁽²⁶⁾。由此可见，即使将铭文之“相”读成“湘”，但也不能认为理解成湖南地区之代称，可见所谓的“南国相（湘）”从内容上来看，也缺乏支撑。

因此，本文不赞同《静方鼎》铭文之“省南或（国）相（？），设”的释读，而认为应当读为“省南或（国），相（？）设”。此处的“相”并非地名，不应和指代湖南地区之“湘”联系。

再来看《作册析尊》的“相侯”（《集成》6002）。先秦“相”地有二，一在河南省安阳附近，一在安徽淮北市。而“相”作为地名，在甲骨金文中多见，如：

（1）甲骨文“相”地，见于《合集》18793：“甲子夕夂大再至于相”，本版可缀合于《合集》18792+《合补》2294+《合集》18795+《合集》3377）之后⁽²⁷⁾。从《合集》所收资料来看，“相”字“木”旁不全，不过“至于”之后尚可辨出“相”二字⁽²⁸⁾。此处之“相”若为地名，应当在中原地区。

（2）金文“相侯”，包括《相侯簋》（《集成》4136，西周早期）：

唯五月乙亥，相侯休于厥臣爰，赐帛金，爰扬侯休，告于文考，用作尊簋，其万年□待□□侯。

《作册析尊/觥/方彝》（《集成》6002、9303、9895，西周早期）：

唯五月，王在，戊子，令作册折兄（覘）壘土于相侯，赐金、赐臣，扬王休……。

此外，还有一件《相公子戈》（《集成》11285，战国），铭文为“岁相公子赠之告（造）”。

目前一般认为，上述《相侯簋》、《作册析尊/觥/方彝》中的地名“相”，大体在中原或其附近地区，如黄盛璋认为“可确定在殷旧都以东的黄河两岸”⁽²⁹⁾。而杨宽⁽³⁰⁾、马承源⁽³¹⁾、李零均认为在安徽淮北市濉溪⁽³²⁾，本文从之。可见《相侯簋》、《作册析尊/觥/方彝》之“相”，也与今指代湖南之“湘”无关。

据此，通过梳理金文中所见的“相侯”铭文，本文认为：《静方鼎》铭文之“南或（国）相”的连读，是不合理的，不当由此引申到所谓的“南国相（湘）侯”；《相侯簋》《作册析尊/觥/方彝》中的地名“相”，或在河南，或在濉溪，而不会是在远离中原的湖南地区。据此，所谓金文“相侯”也就“湘侯”、“南国相”也就是“南国湘侯”之说，缺乏充分证据。《静方鼎》铭文之“省南或（国），相（？）设”，也并不反映西周初期湖南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地理关系。

2. 清华简《楚居》与所谓“楚源自湖南论”。

关于楚的来源，历来争议较多，近来又出现一种新的意见，即“楚源自湖南”，论者具体的意见包括“楚祖祝融地望在南阳而非郑”、“清华简《楚居》所载季连初降之隈山在湖南宁乡炭河里遗址”等⁽³³⁾，由此做出楚源自湖南、而其后北迁湖北等地之论断。

很容易可以看出，这种观点与此前有很大差别。比如关于楚人入湘的时间，早期有学者认为，楚人于西周中晚期进入澧水流域，在春秋早中期进入湘水湘水下游流域⁽³⁴⁾，其后又有学者提出“西周中期”⁽³⁵⁾、“西周末期”⁽³⁶⁾等概括性意见。尽管在具体的时段上有所不同，但却均体现了学界“楚人南迁”的主流意见。

而就“楚源自湖南”的新论而言，从作者的相关论据来看，如列举《水经注·湘水》“（南岳）山下有舜庙，南有祝融冢”等资料，从而来论证“楚祖先祝融之墓在南岳”，从史料的年代来看，这是缺乏说服力的。至于推断炭河里遗址为《楚居》“隈山”，作者的主要论断过程及结论为：一是“隈（影纽微部）”可读“沕（匣纽歌部）”，二是《楚居》所谓“京宗”就是“荆宗”、“楚宗”，也就是“隈（沕）”地、炭河里古城。按，从论者的两个主要论断来看，论断一还存在一定可能性，但如果联系到论断二，则问题就显现了，从《楚居》的原文来看，“京宗”与“隈山”明显不是同一地，而“隈（沕）”地也不等同于炭河里古城。因此，仅仅依据上述文字音韵的联系，而没有更多有说服力的考古资料等旁证，从而得出所谓《楚居》上述资料反映“楚源自湖南”的观点，目前尚难以让人信服。

三、考古材料与湖南先秦史——以“高庙文化属伏羲、炎族团”为例

从已有的考古材料来看，目前在湖南地区有比较多的考古发现，包括：

1. 玉蟾岩发现距今 1.2—1.4 万年的人工栽培稻谷，与距今 1.4—2.1 万年的陶片。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除本地之外，广东英德牛栏洞、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等遗址相继发现距今 1.2—1.4 万年的人工栽培稻，上述资料反映华南地区在早期农业发展上的起源比较早。

2. 道县福岩洞发现 47 枚人类牙齿化石，其年代在 8 万至 12 万年前。这一项发现比较重要，是古人类发展历程中承上启下的一环。近年来，我国学者先后在周口店田园洞、湖北郧西黄龙洞和广西崇左智人洞等地发现早期现代人化石，表明早期现代人至少 10 万年前在华南地区已经出现。而福岩洞人类化石提供了迄今最早的现代类型人类在华南地区出现的化石证据，填补了以往缺乏的现代类型人类在东亚地区最早出现时间和地理分布的空白。

3. 此外，目前发现最早的古城是城头山古城。许宏指出，前仰韶时代城邑（公元前 7000 年—公元前 5000 年）是东亚大陆城邑的初现期，从已经发表材料的 13 处城邑遗址来看，以钱塘江流域上山文化的环壕聚落最早，而在彭头山文化的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可能出现了最早的土围。在仰韶时代及其之前，是从“土围”到“环壕”的时代，而至仰韶时代后期，中原地区的夯

土版筑城址和北方地区的零星石城址才零星出现，并开启了龙山时代同类城邑的繁荣局面⁽³⁷⁾。此前有湖南学者认为，“城”是从湖南澧阳平原起源而传到北方的。按，从上引“城”及其筑城技术的角度来看，显然不能认为中原地区的城，是由澧县“城头山”起源和传过去的。

这些重要的考古新发现，极大地弥补了各种文献中关于湖南先秦记载的不足，改变了对于湖南古史的认识。但面对日益丰富的湖南先秦考古材料，对于其价值的阐释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就考古学角度而言，所涉及的湖南先秦史问题，主要是考古材料与所谓“早期文明湖南中心论”。所谓“早期文明湖南中心论”，主要指的是一些学者根据湖南地区一些较早的年代考古发现，由此突出湖南的重要性，从而构拟出湖南在当时文明发展历程中的起源地或者中心地位。但值得注意的是，就当下而言年代较早的考古发现，能否认为就是相关的起源地和中心？而本地区年代较早的相关考古发现，是否能与古史传说人物及族群相互联系？

此前，本地报道中还引用近期学者提出的早期文明“江汉起源论”，并认为湖南地区的文明比湖北要早，实际上蕴含着湖南为早期文明中心的内涵。但纵使抛开早期文明“江汉起源论”的讨论不计，仅从考古学角度而言，也可以很容易看出“湖南地区的文明比湖北要早”这一论断，也是极其不严谨的。而从当下来看，就考古学材料与湖南先秦史的重建而言，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关于高庙文化的研究及其阐释、评价。

目前关于高庙文化研究成果比较多，有学者提出高庙文化应当与炎、黄族团有关，并认为沅水流域是炎、黄人文思想的发源地，本地最早出现敬天、尊祖先、安社稷等人文思想；高庙文化晚期，和大溪文化早期的城头山聚落，可能就是炎帝族团的邦国国都⁽³⁸⁾。而具体意见包括：

其一，高庙文化早期遗存由伏羲部落所创造。怀化安江高庙文化发现有八角星图像。根据相关资料来看，全国史前遗存中发现八角星图像共近 20 例，其中以高庙早期遗存（距今 7800 年至 7000 年）发现的年代最早，且已具备了安徽凌家滩玉器上八角星图像的基本要素（中心部位的方框、方框外的圆圈、等分的八角星，以及八角星图像外围的圆形天体）。对此八角星图案，有学者认为有双重价值，高庙距今 7000 多年前的“八角星图像”及其内涵，正是高庙先民对于太阳周年运动的摹写，为历法的起源找到了依据；同时也是八卦的原始模型，从而指出这是中国文化重要因素的起源地。由此表明，高庙文化早期先民发明了太阳历，及以太阳（天帝）、龙、凤为核心的完整神系，建筑了大型祭坛，并有专门祭器，还发明了相关艺术构图法则，而这与文献中所见伏羲制定历法与八卦的事迹相吻合，因此可以推断高庙早期文化属于伏羲族团。

其二，文献中记载炎帝处于南方，再联系连山易之得名等，表明炎帝神农氏族团与高庙文化晚期遗存和大溪文化年代等较为符合，由此表明这二种遗存应当是炎帝神农氏族团的文化。

上述看法，可能都还存在一些需要面对的问题。关于高庙遗址中八角星图像的内涵，目前似尚无定论。而仅从历史文献记载的角度而言，关于历法与八卦是否为伏羲所创，记载有很大差别。比如关于历法的起源，除伏羲创造历法之外，文献中的说法极多，《淮南子》卷 19《修务训》“昔者仓颉造书，容成造历”，《史记·历书》“黄帝考定星历”，有学者总结传世文献中有关历法创造之传说，认为商代以前关于创造历法的记载较多，互相抵牾，“顾若详加考究，则知此种记录，皆不可靠。盖其所言，既多互相冲突，且甚违背天文历法之进化程序；记录此等历法之书籍本身往往有作伪之痕迹，或与所记录之历法时代相差极远”⁽³⁹⁾，由此可见，要依据某种古籍的记载，而将历法归结与某个具体人物之创造，应当是缺乏说服力的。

对于八卦的创造传说，也应当如此。关于八卦的起源，文献记载的说法也很多，除去伏羲创八卦的说法之外，还有如《世本·作篇》“巫咸作筮”等说法。实际上，学界也早已认识到，仅仅依据上述文献记载，从而来推断八卦起源于某个人物的创造，是明显不足的，学界逐渐“否定天赐神授的说法，开始想对八卦起源作出科学的解释”⁽⁴⁰⁾。因此，要断定历法与八卦均为伏羲所创，实无确证。而以此为基础，进而判断高庙文化遗存由属伏羲族团，可见明显是乏依据。

就关于连山易的讨论而言，此处判断存在两个明显问题，首先，如前文所述，文献中炎帝处南方的记载，明显晚出；其次，关于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连山乡之得名，如果翻阅相关文献，会很容易看到“连山”得名之原因，系“古时，该地渠水两岸有两颗大树拱形对立，远观似两山相连，故名连山”，而将“连山”与所谓“炎帝创连山易”相联系，是近些年才出现的提法。由此可见，所谓上述两个方面，并不支持所谓炎帝神农族团与高庙文化晚期遗存等有关。

此外，关于湖南高庙遗址中发现的“×”刻划符号，有学者认为是五行观念源头，并将其与后世的甲骨文“五”相联系。实际上这种符号在早期也比较常见，彭头山文化、屈家岭文化中都有类似发现，因此认为是所谓“五行观念源头”或者联系到甲骨文“五”，可能也是过度解读了。因此，本文认为，综览已有相关资料和讨论，要认为湘西“高庙文化”上与伏羲、炎族团有关，还缺乏说服力。

总之，就本文所论相关例证来看，从传世文献中的湖南炎、黄等古史传说而言，多系传播而来，并非原始发生地，不应将相关传说人物“湖南地方化”；从出土文献而言，西周《静方鼎》所谓“湘侯”系误读铭文，清华简《楚居》也无法反映“楚源于湖南”；从考古而言，高庙文化应当与炎帝、黄帝无关。

由此也说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考古材料都各有其特点，因而在湖南先秦史的研究中，必须坚持三者相结合的方向。同时，由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中有关湖南先秦史的材料比较少，在重建湖南先秦史的过程中，考古材料极为重要，甚至可能要居于首要地位，因此要求学者能合理运用考古学材料。对于古代文明的研究而言，不但应读懂有字材料，还应当追求能读懂无字的考古学材料，否则就是自我束缚、画地为牢了。

以上所论，笔者不敢自以为必，尚祈同好教正。

注释

1 比较全面的成果，如伍新福主编：《湖南通史》（古代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5页；向桃初：《炭河里文化的发现与湖南先秦地方史重建》，《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9期；向桃初、王勇主编：《湖湘文化通史》（上古卷），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32-174页。

2 贺刚：《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517页

3 彭志瑞：《湖湘大地才是炎帝文化的母体》，《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4 周甲辰：《舜帝避居舜皇山论》，《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5 宋超：《“长于姜水”、“都陈”与“葬于长沙”——炎帝传说流衍途径考察》，《史学月刊》2010年第4期。

6 赵世超：《拨不开的迷雾——炎帝黄帝与炎黄文化的南迁》，《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7 朱汉民：《“神农炎帝”与湖湘文化》，《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6期。

8 王震中：《从连山看黄帝的起源》，《炎黄文化研究》第11辑，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9 杨东晨：《湘东第一宫——从湖南史前文化论攸县的尧帝宫等遗迹》，《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

-
- 10 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04 页。。
- 11 郭伟民：《中国化进程的一个区域视角——舜葬九嶷与湖南华夏化的历史过程》，《早期中国研究》（第 1 辑），文物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22 页。
- 12 周书灿：《三苗南迁与湖南境内虞夏传说的发生》，《贵州民族研究》2007 年第 5 期。
- 13 阳国胜：《湖南沅陵：大禹之陵》上篇，《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8 年第 6 期。
- 14 徐天进：《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文物》1998 年第 5 期。
- 15 李学勤：《论西周的南国湘侯》，《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 5 辑，岳麓书社 2009 年版，第 155 页；又收入《通向文明之路》，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175-179 页。
- 16 王辉：《商周金文》，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5 页。
- 17 张懋镕：《静方鼎小考》，《文物》1998 年第 5 期，第 88-90 页；收入《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2-43 页。
- 18 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巴蜀书社 2003 年版，第 259 页。
- 19 钟柏生、陈昭容、黄铭崇、袁国华：《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艺文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1212 页。
- 20 张懋镕：《静方鼎的史学价值》，《周秦汉唐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4-121 页；收入《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4-48 页。
- 21 沈长云：《静方鼎的年代及相关历史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 年第 7 期。
- 22 何景成：《西周王朝政府的行政组织与运行机制》，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69、77 页。
- 23 张海：《疑尊、疑卣铭文及相关历史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 年第 5 期。
- 24 李学勤：《静方鼎与周昭王历日》，《光明日报》1997 年 12 月 23 日，收入《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2-30 页。
- 25 李学勤：《静方鼎补释》，《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6-78 页。
- 26 刘继元：《由楚及湘——明清时期湖南别称流变考》，《湘学研究》第 6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07-121 页。
- 27 张军涛：《殷墟甲骨新缀第 36-44 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网站 2019 年 1 月 3 日。
- 28 裘锡圭：《论“历组卜辞”的时代》，《中西学术名篇精读——裘锡圭卷》，中西书局 2015 年版，第 53 页。

-
- 29 黄盛璋：《西周微家族窖藏铜器群初步研究》，《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齐鲁书社 1982 年版，第 286 页。
- 30 杨宽：《西周列国考》，《古史探微》，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53 页。
- 31 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3-64 页。
- 32 李零：《重读史墙盘》，《吉金铸国史——周原出土西周青铜器精粹》，文物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6 页。
- 33 刘俊男：《关于楚史的几个问题》，《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79-601 页。
- 34 高至喜：《楚人入湘的年代和湖南越楚墓葬的分辨》，《江汉考古》1987 年第 1 期。
- 35 郭伟民：《关于早期楚文化和楚人入湘问题的再探讨》，《中原文物》1996 年第 2 期。
- 36 李海勇：《湖南早期楚文化的历史地理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 年第 2 期。
- 37 许宏：《先秦城邑考古》，西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5、66 页。
- 38 贺刚：《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岳麓书社 2013 年版，第 558-589 页。
- 39 刘朝阳：《古书所见之殷前历法》，《刘朝阳中国天文学史论文选》，大象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21 页。
- 40 汪宁生：《八卦起源》，《考古》1976 年第 4 期，后收入《汪宁生论著萃编》，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31 页。